

三十二种大藏经通检

童玮

编

中华书局

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

童 玮 编

中华书局

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

童 玮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54 $\frac{1}{2}$ 印张·1283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定价:85.00元

ISBN 7—101—00665—5/B·136

目 录

- 一、编制说明·····(1)
- 二、凡例·····(5)
- 三、汉文大藏经简述·····(7)
- 四、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21)
- 五、经籍名称首字笔画索引·····(29)
- 六、同经异名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33)
- 七、同经异名首字笔画索引·····(63)
- 八、通检(1—4175号经籍)·····(87)
- 九、译撰人名及其译著号码索引·····(725)
- 十、梵文或英文经籍名称索引·····(749)
- 十一、附录——大正藏 56—85 卷, 图像 1—12 卷,
 (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卷)经像名称首字汉语
 拼音和笔画检索和经像名称简目(1—1091号)·····(819)

一、编制说明

本《通检》共收入两种经录和二十种不同版本汉文大藏经中的佛教典籍 4175 种, 这些经录和大藏经的名称和时代如下:

- 1.《开元释教录》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
- 2.《房山石经》 (隋——明, 石刻本, 私版)
- 3.《开宝藏》 (北宋官版)
- 4.《崇宁藏》 (北宋私版)
- 5.《毘卢藏》 (北宋——南宋, 私版)
- 6.《圆觉藏》 (北宋——南宋, 私版)
- 7.《资福藏》 (南宋私版)
- 8.《磻砂藏》 (南宋——元, 私版)
- 9.《赵城藏》 (金代私版, 元代补雕)
- 10.《普宁藏》 (元代私版)
- 11.《弘法藏》 (即《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元代官修经录)
- 12.《洪武南藏》 (明代官版)
- 13.《永乐南藏》 (明代官版)
- 14.《永乐北藏》 (明代官版)
- 15.《嘉兴藏》 (明——清, 私版)
- 16.《清藏》 (清代官版)
- 17.《频伽藏》 (清末——民国初年, 私版, 排印本)
- 18.《普慧藏》 (民国私版, 排印本)
- 19.《高丽藏》 (高丽官版)
- 20.《弘教藏》 (日本明治年间, 私版, 排印本, 1880—1885)
- 21.《续藏》 (日本明治——大正, 私版, 排印本, 1905—1912)
- 22.《大正藏》 (日本大正——昭和, 私版, 排印本, 1924—1934)

以上各版藏经的雕印情况, 请参阅“汉文大藏经简述”, 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 1.《开元释教录》虽系经录, 但它代表唐代宫廷本写经目录, 其分类系统和千字文编次为

后来各版大藏经所遵循，因此有必要把它列入以备参考（《频伽》、《弘教》两藏虽然采用了明代智旭的分类系统，但编次仍以千字文顺序为主）。

2.《房山石经》是我国仅有的几部孤本藏经之一。它虽然没有刻全，而且还杂有极少数的道教经卷在内，但保留六十余种其它藏经所没有的古逸经籍在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底本的一部分来源于唐代的宫廷写本；石经中辽、金两代雕造的典籍，又是早已散失殆尽的《契丹藏》的覆刻本，因此，《房山石经》是校勘各版藏经的优良版本。

3.《开宝藏》为我国木版雕印的第一部藏经，是以后各藏据以编辑、刻造的祖本。目前流传下来的虽还不到十卷，而且连目录也早就佚失不存，但无论从佛教文物或藏经版本源流来看，却有着最大的历史价值。因此，根据《开元释教录》入藏内容（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复原其经目，收入《通检》，以供参考。至于后来咸平、天禧和熙宁年间的三次修订，继续增入《贞元录》所收典籍和宋代的新译经，因为其它各藏都已纳入，就没有必要再行列入《开宝藏》所收经籍项下。这样安排是否恰当，尚祈有关学者和专家们教正。

4.《契丹藏》一直没有过传世印本，直到1974年时方在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12卷零散本，由于数量过少，似乎没有列入《通检》的必要。（《房山石经》中辽、金时代所刻的经卷，基本上是《契丹藏》的覆刻石本）。

5.关于《弘法藏》的问题——过去一直认为《弘法藏》是元代官刻本的大藏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是此藏的目录，但没有印本流传下来。从《至元录》的序文中证明，当时不过是用藏文本参对汉文藏经校核梵文经名而编出的经录，并无刊刻全部大藏之事，所以《弘法藏》实际并不存在。所谓《弘法藏》者，仅是《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修订本。为了方便起见，仍沿袭旧说，把《至元录》所收经籍纳入《弘法藏》编进《通检》，主要是《至元录》所入经卷较多，有的是仅见于《房山石经》，如唐代不空所译的《都部陀罗尼目》一卷和道宣撰的《东夏三宝感通录》三卷等；有的则是其他版本藏经所无的典籍，如玄奘译的《入对法论集胜义疏》三卷。

6.《普慧藏》是本世纪四十年代编印的一部不完整的私板大藏经，仅印行过一百册，而且流传不广，但它收入了汉译南传佛教的少数典籍和其它各版藏经所无的部分经卷。基于这个理由，所以也列入《通检》，以便参阅。

7.金陵刻经处计划刻印的百衲本大藏经，虽已刊出部分发行，但均系较为通行的卷册，各版藏经都存。金陵刻本始终未成为一部完备的大藏经，因此并无必要列入《通检》。

《通检》主要是根据明刻《嘉兴藏》为底本参考编制的，有些经卷本来是前代译著，但后来却增入了序、跋之类的文章，为了便于参阅起见，未予删除，仍列在经名之后。如姚秦时代（384—417）鸠摩罗什所译的七卷本《妙法莲花经》，明代的《南、北藏》和《嘉兴藏》都增入了明太宗朱棣的“御制序”，在此以前所增的唐代（618—907）道宣的“弘传序”，明代各藏中也同样地保留下来。

《通检》中的经籍梵文或英文译名，部份来自日本南条文雄博士译补的《大明三藏圣教目

录》(《永乐北藏目录》)和《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谨此致以谢忱;其它则系编者转汉为梵、为英。原则是印度经论名称基本上用梵文译出,中国、日本、高丽、新罗等疏释名称则用英文译出,但也存在着梵英兼译的混同情况。由于编者对佛籍涉猎不深,学识浅陋,必然地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错漏疏失之处,诚恳地请求使用本《通检》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如果《通检》对于从事哲学、历史、考古、文学、图书馆学、佛教艺术和佛学研究的同志们在查阅佛教典籍方面或多或少地能够节省一些时间,那也可以说是编者间接地为四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将是我的最大荣幸。

《通检》的梵、英文经籍名称索引和《大正藏》第56—85卷和图像1—12卷经像名称的大量卡片工作,曾经得到刘纯保、宫静、方广镛三位同志不厌其烦地给予协助,尤其是方广镛同志花了不少时间校正了《大正藏》第56—85卷,图像1—12卷经像名称中的错漏之处,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谨以深切的心情向季羨林教授和黄心川教授表示我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编写《通检》的过程中给我的关怀和鼓励,没有他们的关怀和鼓励,我是不可能有足够的信心竭力来完成——由于个人学力所限,完成得并不好——这一艰巨的工作的。

编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二、凡 例

- 一、本《通检》分为正编和附录两大部分。正编录入《开元释教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和其他历代二十种版本大藏经所收的经籍共 4175 号；附录部分为《大正藏》56—85 卷和图像 1—12 卷经像名称及《昭和法宝总目录》三卷 1091 号简明目录。经像名称按首字的汉语拼音音序排列，前附首字音节和笔画检索，以便检阅。
- 二、正编录入的 4175 号经籍名称，按首字汉语拼音音节依次排列（首字相同而第二字不同者，再按音序依次排列，其余类推），其顺序为 A、B、C、CH、D、E、F、G、H、J、K、L、M、N、O、P、Q、R、S、SH、T、W、X、Y、Z、ZH，共 26 部。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在 J 部的 JIN 项下查到。
- 三、所列经籍名称，除依次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外，还分别列有卷册数目，译著人姓名、时代，该经的异名，经名的汉语注音，梵文或英文的译名及简略的英文题释等；该经如果分出章节，则列出章节名称和所属卷册，最后为各版藏经中该经的千字文编次及函册数目等项。如：

2222.《妙法莲花经》 七卷

（姚秦）鸠摩罗什 译

又名：《法华经》、《新法华经》

MIAOFA LIANHUA JING

Saddharma-puṇḍ arika-sūtra

Translated by Kumārajīva, of the Yao Qin dynasty, A. D. 384—417, 7 fasciculi, 28 chapters. There are two prefaces and one colophon namely: 1. That by the Emperor Tai 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dated A.D.1420; 2. That by Dao Xuan, a famous buddhist priest of the Tang dynasty, A.D.618—907; 3. That by Seng Rui, one of the disciples of Kumārajīva, written in the 8th. year of Hong Shi period (406).

御制序 明太宗文皇帝（朱棣） 卷一

弘传序 （唐）道宣 卷一

序品 第一 卷一

方便品 第二 卷二

.....

.....

妙庄严王本事品 第二七 卷七

普贤菩萨劝发品 第二八 卷七

后序 (姚秦)僧睿述(弘始八年)

开元录,开宝,崇宁,昆卢,圆觉,资福,磧砂(103册),普宁,洪武南(缺佚)(夙);房山石经(无千字文编号);赵城,丽藏(鸣);弘法(及);永乐南,永乐北,嘉兴(37函),清藏(草);频伽,弘教(盈₁);大正9—1

四、《通检》正编之前附有“经籍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经籍名称首字笔画索引”、“同经异名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和“同经异名首字笔画索引”等四种索引;正编之后附有“梵文或英文经籍名称索引”(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和“译撰人名及其译著号码索引”(按时代先后排列)两种,以供需要时查阅参考。

五、同经异名中若异名经首字相同者,不列入同经异名索引中,而异名经经名则顺序列在通检中该经经名之下,可一索即得。如:

2763.《思益梵天所问经》 四卷

(姚秦)鸠摩罗什 译

又名:《思益经》、《思益义经》

六、不少经籍名称前原有的“佛说”、“大方广”和“大方等”字样者,一律省去,以期易于检索。

七、经籍名称前原有的“大乘”字样,除不能省略者,如《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疏》外,其它则一律略去。

八、《磧砂藏》影印本,各图书馆所藏较多,使用频率也大,影印本编印时除原有的千字文编次外,还附有各经所属册次。《通检》除列出原千字文编次外,还在括号内注明影印本各经册次,以便查找。

九、《嘉兴藏》所入各经,除原千字文编次外,亦在括号内注明各经所属函号。

十、《房山石经》所入经籍有镌刻年月者,也在括号内注明年号,部分经籍还附有原拓片编号。如《救护生命经》一卷,无千字文编号,重熙九年刻,8—603。

十一、各藏所入的佛教徒视为疑伪经及其它宗教典籍,为了保存该藏经的原貌,一律不加删除。如:《老子化胡经》、《天公经》、《续命经》、《新菩萨经》、《高王观世音经》、《血盆经》、《波斯教残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摩尼教下部赞》、《玉皇经》和《玉皇本行集经》等。

三、汉文大藏经简述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也称为“三藏”或“藏经”，系佛教典籍汇编而成的丛书名称。其分类起源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不久，他的弟子们为了保存佛的说教，集中在一起进行“结集”（会诵及编纂）。经过几次的“结集”后，大藏经的内容也就基本上定了下来，此后还增入了某些著名佛教徒的论著，即所谓的藏外典籍；因此大藏经包括了经、律、论和有关经、律、论的疏释等。

佛教自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而逐步形成了汉文和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大藏经。

中国大藏经可以分为两个大类：1. 汉文大藏经；2. 少数民族文字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又可分为国内本和国外本两种。

汉文大藏经编次的形成，首先是经籍目录的编定。据《隋书·经籍志》和《历代三宝记》所载，梁武帝萧衍在天监十四年（515）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由沙门僧绍撰写成《众经目录》四卷，其后三年（天监十七年），又命宝唱改定，共 1433 部，3741 卷。这可能是佛教经籍首次编纂为大藏经的记录。十余年之后，北朝的魏孝武帝元修也在太昌元年至永熙三年间（532—534），整理了皇家经籍，命舍人李廓编撰了《魏世众经目录》，共 427 部，2053 卷。在此以前，虽然曾有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宁康二年（374）道安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和刘宋朝代（420—479）编纂的《众经目录》二卷，但只是综集群经，列出目录，并未进行编次。不幸的是，这两部较早的经录早已散失不存，就连僧绍、宝唱和李廓所编纂的经录也同样地佚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隋书》和《历代三宝记》的片断记录中获悉并不完整的佛典编纂成藏的经过而已。

大藏经的编次基本定型之后，由南北朝起至唐代为止，随着译出的佛教经典日渐增多，各家编撰的经录继之而起，总计二十余种。现在除唐代的十种全存之外，隋代五种三存二佚，北魏、北齐三种全佚，梁代五种一存四佚。在这些经录中，最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当推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僧祐编纂的《出三藏记集》七卷，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编纂的《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和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智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及“略出”四卷。《开元释教录》博采各家经录的优点，并订正他们的疏漏之处，以编纂严谨、记载翔实和校核精细著称。尤其是“略出”四卷首先创用了用千字文顺序作为佛经编次，便于寻检，成为宋代以后各版雕印大藏经所遵循的编目方式。

从南北朝起至木版雕印技术发明之前,佛教经典的流通,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之间,因此,写经之风大为盛行,经生成为当时的专门行业。粗略地统计一下,自陈武帝下令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西明寺写一切经为止的一百余年间(557—661),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就达八百多藏,二百余万卷;但保存到今天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数量,而且很大的一部分早已流失国外。近年以来,在新疆等地曾有较大数量的古代写经发现。

隋大业年间,幽州(今北京地区)沙门静琬,秉承其师北齐南岳慧思的发愿,于房山雕造石刻大藏经一藏。静琬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拓印流传,而是鉴于在此以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1)和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下令废止佛教,当时寺庙被没收充作王公第宅,经像被焚毁,僧徒被迫令还俗。后来虽然佛教又重新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获得复兴,但这两次的废佛运动使得僧徒们担心,不知什么时候还会有再一次的“法难”来临。把佛经刻在石头上保存,是避免遭到焚毁的安全办法,准备纸写本的经卷被焚之后,可用石刻的充作底本,进行复制,不致失传。《房山石经》自静琬始刻,先后共达千余年之久(7—17世纪),历经隋、唐、辽、金、明等五个朝代(元代时除个别佛教徒对少数经碑作了修理之外,刻造工作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这部石刻大藏经在刻造过程中,曾受到历代封建皇室、职官和佛教信徒们的捐施和支援,得以绵延千余年之久。开元十八年(730)时,唐玄宗李隆基的八妹金仙长公主曾大力施助,奏请玄宗赐给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石经底本,并命《开元释教录》的著者西崇福寺沙门智昇送往房山石经山交付。由是可知,《房山石经》中保留着不少唐代宫廷抄本佛典的原貌,是校勘现在流传有关佛经的最为可靠的资料。

《房山石经》由于没有按照大藏经编次顺序刻制的缘故,同时又受到不同时代施刻信徒们发愿的限制,比较流行面广的佛经复刻本较多,如《金刚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石经全部经碑总数虽然有14620片之多(残碎经石420片未计入此数),拓片共三万余张,但经种数目只有一千部左右(其中有的经只刻了一部分),并且还包括少数几部道教经典在内,因此,它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律藏和论藏刻的最少)。但是《房山石经》具有其它各版本刻本大藏经很少有的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些特点:

1. 石经保存了六十余种各版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籍,这些佛经不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

2. 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

3. 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六千则的施刻人题记,其中有明确纪年者几占四分之一,时代以辽代最多,唐代和金代次之。这些题记反映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

4. 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阙,有

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

5. 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对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的政治区域规划,特别是关于燕京的城坊布局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石刻大藏经除《房山石经》之外,永乐十八年(1420)三月在开雕南、北两部藏经时,明太宗朱棣曾下令刻制石经一藏,安置大石洞,并谓:“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这部石刻大藏经是否开雕,未有进一步的记录,大石洞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如果确实刻过而藏之于石室,尚有待于今后的发现。

五代、宋初时,雕版事业兴起,开始有了木刻本的佛经。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命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印第一部大藏经开始至清代,相传曾有过经版二十余副。据现存资料,共有下述几种记录:

《开宝藏》——始刻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完成于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八年(983),先后刻了十三年,经版十三万块。内容是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共480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英”字,5048卷;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现存最早者为开宝五年印本。首刻全藏印本曾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由日本沙门裔然传入日本。《开宝藏》刻成之后,除了印刷流通之外,后来还经过比较重要的三次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和《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1. 咸平修订本——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到真宗赵恒咸平年间(998—1003)的校订本。

2. 天禧修订本——宋真宗赵恒天禧初年(1017—)时的校订本。此本曾于真宗乾兴元年(1022)传入北方的契丹和高丽。

3. 熙宁修订本——宋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此本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

熙宁以后,还陆续不断地有所增入,到北宋末年时,已积累到653帙,6620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现存的数卷开宝年间雕造,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的经卷,是宋版书中的精品之一。

《契丹藏》——又名《辽藏》。大约在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年间(1031—1032)开雕,至辽道宗耶律洪基清宁九年(1063)前竣工,刻了三十余年(清宁九年时,契丹曾把这部藏经的印本赠给高丽王朝)。《契丹藏》是在1022年传入的《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增入了一些当时流传于北方的特有经论译本而编定的,如辽道宗的《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德云集思孝作序的《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非浊的《随愿往生集》二十卷,筏提摩多的《释摩诃衍论》十卷,一行的《大日经义释》十四卷,觉苑的《大日经义释演秘钞》十卷,行琳的《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三十卷等。

据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志延所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所说,

这部藏经共 579 帙。它的千字文编次应是“天”字起到“灭”字止。虽然从有关佛教史料的零星记录中知道一些《契丹藏》的雕造经过，但以前并未发现过流传的印本，而且误认为系折装本的装帧形式，直到 1974 年检修山西应县木塔时，在塔中发现十二轴之后，方始获得确证，系卷轴本版式，每版 27 或 28 行，行 12—21 字不等，以 15—18 字为多。每行字数也有较为一致的经卷，如《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摩”字号，每行均为 17 字，而且卷首附有木刻释迦说法图版画。另外，塔中还保存 35 卷其它辽刻佛经，其中有在《契丹藏》正式开雕前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五年（1025）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施刻的《妙法莲花经》，可能不是正式入藏的版本。

《契丹藏》全藏内容虽早已失传，但辽代太平七年至保大元年（1027—1121）所刻的《房山石经》大量经碑，都有千字文编次，它所依据的底本，除《契丹藏》外，不可能是其它版本。《房山石经》中辽刻部分和金代所刻的经卷即《契丹藏》覆刻石本，应是不容置疑的事。

《崇宁藏》——即福州东禅院本大藏经，系福州东禅等觉禅院住持冲真发起劝募雕造。始刻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至宋徽宗赵佶崇宁三年（1104）竣工，共二十五年。全藏 580 函，1440 部，6108 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號”字号；首次采用折装式装帧。版式为每版 36 行，折为 6 个半页，每半页 6 行，行 17 字。此后的《昆卢》、《圆觉》、《资福》、《磧砂》、《普宁》、《洪武南》、《永乐南》等七种版本的大藏经除了《昆卢藏》每版仍为 36 行外，其他各藏则为每版 30 行，折为 5 个半页，每半页 6 行，行 17 字，仍遵循《崇宁藏》的版式不变。

《昆卢藏》——即福州开元寺本大藏经，由该寺僧人本明、本悟、行崇等发起劝募，并得到当地信众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等的赞助，于宋徽宗赵佶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十一年（1151）竣工，历时四十年。全藏 595 函，1451 部，6132 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起至“颇”字号。

《圆觉藏》——即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约在北宋末年开雕，南宋高宗赵构绍兴二年（1132）基本刻完，系由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全家发愿捐助，比丘净梵、宗鉴、怀深等负责劝募雕造。全藏 548 函，1435 部，5480 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起至“合”字号。《圆觉藏》经版后来于南宋理宗赵昀淳佑（1241—1252）以后移藏于资福禅寺。

《资福藏》——即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开雕年月不详，南宋孝宗赵昚淳熙二年竣工（1175）。全藏 599 函，1459 部，5940 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起至“最”字号，较《圆觉藏》增入 51 函。《圆觉》、《资福》两藏版式相同，所收经籍又基本一致，而且《圆觉》经版后来又移藏资福禅寺，因此在印本上不大容易区别开来，故有《资福》本系在《圆觉》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之说。这两部藏经在南宋理宗赵昀景定（1260—1264）以后的印本曾陆续传到日本，各寺所藏甚多。清朝末年杨守敬向天安寺（一说为近江国伊香郡菅山寺）购回一部（原缺 600 多卷），现由北京图书馆入藏。

《赵城藏》——又名《赵城金藏》，1933 年首次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是金代

由民间劝募在山西省解州天宁寺刻成的大藏经。发起人为潞州崔进的女儿法珍，相传她断臂募缘来完成刻经事业，很多佛教信众深受感动，纷纷捐资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大约在金熙宗完颜亶皇统九年(1149)前，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工，历时三十年。全藏刻成之后，崔法珍曾于大定十八年(1178)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完颜雍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二十一年时，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二十三年时，赐紫受封为“宏教大师”。

《赵城藏》的原刻版式，基本上是覆刻《开宝藏》蜀刻版印本的，也是卷轴式装帧，每版23行，行14字。它保留《开宝藏》蜀版印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和它的另一覆刻本——《高丽藏》初刻印本都散失殆尽的情况下，《赵城藏》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金末元初时，《赵城藏》经版曾受到兵火损毁一半。约在太宗窝阔台八年(1261)由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辖职官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还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补雕后的经版基本上恢复《赵城藏》旧刻内容，千字文编次由“天”字到“几”字号，共682帙，6900余卷。但工作草率，字体不一，版式也不一致，每版22行至30行不等，每行14字至27字不等，而且还杂有少量书册或经卷在内。现存的《赵城藏》系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初年(约1261)的补雕印本，共4957卷(1952年又发现62种152卷，此后还陆续发现过一些零散经卷，现约存5100余卷)。赵城广胜寺入藏的这部藏经，还经过重新装璜，在卷首加裱木刻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此后由于年久散失缺损之故，在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年(1592)时，解州静林山万寿禅寺僧悟顺抄补过若干卷，清世宗胤禛雍正九至十一年(1731—1733)时，在信徒的捐款赞助下，广胜寺又集僧俗进行过一次大量的抄补缺卷。现存的补抄本200余卷，即系这两次的补本，因系根据明代《永乐南藏》本进行抄录，造成编次错落或者重复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妄图劫走这部稀世之珍的大藏经。党中央获悉情况后，曾电令赵城县委采取断然措施，全力保护，后由赵城县委组织广胜寺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配合太岳军区派出的战士共同把这部藏经安全地转移到一个山洞中保存下来。全国解放后，《赵城藏》被运到北京，但由于洞内潮湿，受潮时间过久，不少卷册毁损不堪，几乎难以修复。经过十三年辛勤劳动，好几位装裱工艺师以他们精湛的技术，细心揭裱修补，终于使《赵城藏》恢复了原有的面貌，入藏于北京图书馆。

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北寺图书馆发现31种，559卷，卷轴式装帧木刻雕印本佛经。这些经卷刻工比较草率，字体不一，版心高低不等，每版行数和每行字数也不统一，但以每版25行，每行14字者为多。每卷前附护法神王木版刷印扉画一幅，卷末盖有长方形木图记一方，共171字，文曰：

“蒙哥皇帝福荫里，燕京南卢龙坊居住奉佛弟子权府张从禄、妻王从惠泊女张氏感如来之咐嘱，贺圣朝之弘恩，发心施财，命工印造释迦遗法三乘贝叶灵文一大藏，成（盛）一（以）黄卷，贮以琅函，安置在京大宝集寺。析斯圣教永远流通，……丙辰年六月朔。”

从这个图记的文字记载证明，这些经卷是在元宪宗蒙哥丙辰年（1256）刷印的某一藏经的残存部分，经版的雕造年份决不可能晚于1256年。原藏于燕京大宝集寺。据说在元代初年由京运至西藏，入藏于萨迦北寺图书馆，详细经过已不可考，当时可能是一部全藏。从千字文编次看，虽然残存本仅占全部藏经的少数（由“天”字起至“羽”字帙为般若部诸经，中间有部分缺失；“翔”字至“裳”字帙为宝积部诸经；“章”字帙为《华严经》；“鸣”字帙、“食”字帙及“覆”字帙均为五大部外诸重单译经中的各经以及“衡”字帙的《本生心地观经》），但它们的编次和《赵城藏》的编次完全一致，而和其它版本藏经不同。其次，不论从版式、字体、刻工等方面的判断，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赵城藏》输版入燕京后补雕印本。至于扉画不同，也和《赵城藏》扉画情况类似，是元代补雕印本附加的装帧。大宝集寺藏经残卷中的某些卷册，恰好可以补上赵城广胜寺本早已缺失的部分，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1931—1935年时，北京三时学会曾把《赵城藏》中所特有而为其它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120册，12函发行。另外，《楞严经》十卷，与通行本对校，勘出百多字的不同后，照原大影印过400部，并仿原来装帧，以小红木圆轴粘卷，竹签结束流通。

《磻砂藏》——全称为《平江府磻砂延圣院大藏经》。这是南宋时代私刻版本大藏经的最后一部，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磻砂延圣院，后来改名为磻砂禅寺（今江苏吴县陈湖）。大约在宋理宗赵昀宝庆（1225—1227）、绍定（1228—1233）年间开雕，理宗端平元年（1234）编定，并刻出“天”字至“合”字548函的目录。理宗宝祐六年（1258）以后，因延圣院火灾和南宋垂亡的原因，刻事曾中断三十年。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元年（1297），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主持，才又继续进行下去，到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二年（1322）方始完工，历时九十余年，计增入了“济”字至“烦”字号的43函，全藏“天”字至“烦”字号共591函，1532部，6362卷。由于经过两个朝代的更迭和兵燹，原刻板片被毁损部分，曾用其它散刻本补充，所以后来的印本中间夹杂了一些元代寺院所刻的补本，甚至还附有翻刻的《普宁藏》数函在内。现在保存下来的原藏陕西开元寺和卧龙寺的全藏（略有残缺）是在明初洪武二十三、四年间（1390—1391）刷印的。1931—1935年时，曾用这部藏经影印过500部（缺失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入）。影印本《磻砂藏》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原来每块版五个半页缩印为半页，约缩小二分之一；原为一函者装订为一册，千字文编号次第、卷次均照原函不变。全藏中函卷不详而经名阙佚者还有十一卷尚未补入影印，即“宁”字函的第三、第四、第九和第十卷；“更”字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卷；“横”字函的第七和第八卷；“何”字函的第八和第九卷。到目前为止，“宁”字函、“更”字函和“横”字函阙佚经

名九种九卷已经查出,仅“何”字函的两卷经名尚未查获。

《普宁藏》——全称为《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1299)竣工。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至“感”字号,558函,1430部,6004卷。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时,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本藏经内(即《赵城藏》版输入燕京后的元代补雕本)选出南方版本藏经所缺的秘密经约97部,315卷刻完,编为“武”字到“遵”字28函随同《普宁藏》一同流通,最后又补入“约”字函的七部六卷,收入元代沙撈巴译的秘密经轨五种,《白云和尚初学记》和《白云和尚正行集》二种。除“武”字至“遵”字号的28函秘密经不计外(因详细目录遗失),应为559函,1437部,6010卷。《普宁藏》基本上是依据思溪《圆觉》本覆刻的,版式略小于圆觉本,但刻工精巧细致,而且装帧古朴典雅。

《弘法藏》——相传系刻于元代的官版卷轴式藏经,但没有流传的印本,一般公认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285—1287)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即系《弘法藏》的目录。从现存有关《弘法藏》的一些资料看来,所谓《弘法藏》者,和《赵城藏》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赵城原版(解州天宁寺版)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曾由耶律楚材主持进行过一次补雕,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又“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江西吉州路前官讲报恩寺讲经论释克己序文)。这次的“楷定”,是根据《开元释教录》、《贞元续开元释教录》、《祥符法宝录》、《景祐法宝录》,再加上宋仁宗赵祯景佑四年(1037)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译师四人所译经论20部,115卷和以上四种经录未编入的经律论55部,141卷,共为75部,256卷(即所谓的《弘法录》及遗编),参对藏文译本,校核梵文经名,论讎而成的经录——即《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录》所收的弘法入藏录经论,实际不止75部,256卷,还有中国著述79部,1002卷(“羽”字至“植”字号,109帙)。以上两类,共154部,1258卷。

《至元录》共入经1644部,7182卷(“天”字至“植”字共704帙),所收经卷之多,冠于任何经录。这个经录的编定,可能在当时是打算用来刻造元代官版大藏的,但并未付诸实现。由于曾有过《弘法入藏录》的编辑,导致了《弘法藏》存在之说。据至元二十六年(1289)灵隐寺住持净伏在《至元录》序文中说:“大元天子……万几暇馀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从这段话中可以证实元世祖首先是把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印本有毁损者进行补写,没有编入的典籍书写补入,并且对这一部分(即《弘法入藏录》经籍)还刻了经版流通,没有提到雕造全部大藏经的事,足见《弘法藏》的存在,并无其事,所谓《弘法藏》,实际上仅是《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元官版大藏经》——1982年12月在云南发见,仅存32卷,云南省图书馆入藏。经板较现存各版藏经都大,每版七个半页,每半页6行,行17字,共42行。经文行间疏朗,字体严